

SONGSHIJIAJU

宋式家具

中国传统家具的形制转型
及风格流变

梁旻·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宋式家具

中国传统家具的形制转型及风格流变

梁 旻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南京·2016

内容提要

本书选择宋代为承前启后的研究对象，对大量的史料进行借鉴、研判和根究，以期厘清时代变迁中古典家具演化的基本脉络，也是为“明式”铺开的饕餮大宴加奉几道新饌，为“明式”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编织几条经线。至于宋代家具能否因为独特的制作方式和作品的格调、完整性、统一性等内涵，而被认可为“宋式”，本书在最后也提出了一些观点，作为对我国古代造物智慧的桑梓之敬。

本书可供家具研究者、家具设计师及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学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式家具：中国传统家具的形制转型及风格流变 / 梁旻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641-6441-6

I. ①宋… II. ①梁… III. ①家具—历史—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TS666.20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7761号

书 名：宋式家具：中国传统家具的形制转型及风格流变

著 者：梁 旻

责任编辑：孙惠玉 编辑邮箱：894456253@qq.com

文字编辑：莫凌燕

出版发行：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南京市四牌楼2号 邮编：210096

网 址：<http://www.seupress.com>

出 版 人：江建中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排版：南京新洲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3.75 字数：337千

版 次：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1-6441-6

定 价：39.00元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发行热线：025-83790519 83791830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025-83791830

作为中国古代木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家具的变迁，从形制、风格到起居方式，与木构建筑的演进相适应。比如，秦汉时期的低制式几、案、榻等古风家具，与当时简拙的建筑形式和席地的起居方式是相适应的。

中国传统家具变迁的第一次大转折以丝绸之路为背景，西域交通史提供了高制式家具传入华夏的清晰线索。经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吸收和涵化过程，在隋唐和五代的绘画和实物资料中，已可看到成型、成套的高制式家具蔚然成风，入宋以后犹然。如果说木构建筑的形制样式受制于唐营造律令，定格于宋《营造法式》，完成了从“古风”向“古典”的蜕变，那么宋代家具普遍地从低制式转化为高制式，是否也意味着与建筑演进相伴随，完成了从古风家具向古典家具转型的历程，从而促成了“宋式”的登场？进而，若此说成立，那么“宋式”是否为“明式”的前世或先河呢？

如此看来，就古代家具的流变脉络而言，不究宋，何解明？然而这一富有魅力的挑战性学术命题，长期以来似乎并未被学界充分关注。

梁旻博士就是以此为出发点，从宋《燕几图》和明《蝶几图》的比较入手，将形态解析、类型比较、史料佐证和逻辑推理相结合，既发掘了传统家具匠艺文心的深层内涵，也触及了其社会文化的广泛外延，从而得出了高制式古典家具流行于北宋的贵胄坊间，滋养于南宋的儒雅内敛，并为后来经典的“明式”奠定了基型的研究结论。

本书观点新颖，视角独特，结构完整，脉络清晰。书中既有宏观叙事，又有微观剖析，不少段落都可圈可点，是一篇有创意且用功用心的传统家具史论，反映了作者敏锐的学术观察力和思考力。愿本书的出版，对推动我国传统家具研究有所助益，对作者学术水平迈向新的高度有所激励。

是为序。



乙未春日于上海寓所

我国传统家具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古典”家具的研究，始自对明代硬木家具的赏鉴。其先驱者，有在杨耀先生帮助下于20世纪40年代完成了《中国花梨家具图考》的德国学者古斯塔夫·艾克（Gustav Ecke），他已经从社会政治、思想、建筑、材料等不同方面分析了明式家具的成因。还有王世襄、杨耀、朱家溍、李宗山等各位先生，他们阅古览经，寻访实测，对明清家具进行了分类、断代及界定名词、术语的大量工作。还有美国学者乔治·纪慈（George Kates），他1948年出版了名为《中国家用家具》的专著，所收家具实例已经超过硬木家具的范畴，包括许多漆木家具和柴木家具。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复兴祖国文化和古典家具收藏热的推动下，研究古家具的学者和研究文献迅速增多，侧重则各不相同：有按朝代阐述数千年家具流变的，如王富瑞、胡文彦、刘森林、阮长江、林东阳、李宗山、胡德生、蒋绿荷、朱方诚、娄军委、唐开军等；有详尽分析明式家具造型、结构、工艺、风格和文化内涵的，如王世襄、杨耀、陈增弼、阎纪林、张帝树、许柏鸣、余继明、刘曦卉、王叶等；有钻研中国传统家具的装饰图案和手法并归纳整理其演变过程的，如吕九芳、林东阳、马涛、行淑敏、唐彩云等；有专注于清式家具的风格与特征，分析区域风格成因及发展过程的，如张炳晨、淮安国、侯林辉、陈立未等；有潜心于少数民族家具特点及其与明式家具关系的，如李德炳、蒋绿荷、张瑞、张远群、邹联付、袁哲等；有探索中国古典家具与西方家具历史关系的，如方海、周浩明、王美艳等；有追问中国早期古典家具特点和文化渊源的，如张十庆、邵晓峰、聂菲、张彬渊、薛坤、蒋正清、叶德辉等；有分析家具艺术与其他艺术相关性的，如李伟华、许柏鸣、徐永吉、刘颖睿、王树良等。可以说，中国传统家具和古典家具的研究在20世纪后期进入了十分活跃、成果倍出的时期。

被王世襄先生推崇为中国家具巅峰作品的明式家具，具有造型简练、线条刚毅、比例匀称、结构严谨、灵巧慧智、坚固耐用、风度翩翩的优秀品质，其科学性和艺术性，都已得到了众多专家的认可，几乎每篇涉及明式家具的文章也都会提及。但这些古典家具最令人瞩目的品质，究竟是如何得来的呢？古典家具研究领域一直承认明式家具继承了宋代家具的优良传统，也赞美宋代家具新颖、挺秀、雅洁。但“明式”和“宋代”家具究竟有何不同？宋代家具的形制特点有哪些？这些特点是什么时间如何形成的？又究竟有哪些特点被“明式”传承？这些问题因种种原因而没被深入深究。

宋代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很多，宋代经济、城市、生活巨大的发展变

化是不容忽视的：城市到住宅各级空间的发展，园林的兴盛，对外贸易、国际交流与市场繁荣的彼此呼应，各阶层对高型家具的认可和需求增长，以及家具制造成套化和批量化的倾向等等。在前辈学者中，陈寅恪、邓广铭、漆侠先生就将宋朝视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鼎盛期，认为其时代的教育、经学、科技、史学、词作散文等项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

但“古典家具”的诞生依然是模糊的。现存实物数量极少是主要的原因，对文献资料的逻辑整理也还并不全面。因此，现有的对宋代家具的研究存在不少问题。

一 “古典家具”界分的问题

我国的低坐传统长达几千年，不少学者认为传统席坐是因东汉西方“胡床”的传入而发生变化。这种观点与历史事实有矛盾。因为“胡床”传入后其基于8根直材的造型与结构，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生变化。史料显示“胡床”的普遍使用在于其便于携带，宋代陶谷的《清异录》称其“转缩须臾，重不数斤”，所以它对建筑和室内空间的功能、布局都影响甚微。与此相对的是佛教传入时带入的西方家具与中国传统建造方式结合而产生的混合风格家具频频出现。这显示源于宗教信仰领域的影响更有可能改变中国立足于礼制的传统习俗。所以说我国家具从“古风”向“古典”形制的逐步转化，以及“古典家具”出现的时间节点还需要研究和界分。

二 起居方式的转化与定型问题

隋唐时期，古人还未离开以床、榻为中心的起居生活方式，垂足而坐的高足家具种类发展不平衡，形体和构造也处于过渡时期^①。从汉末到北宋中期，传统的低型家具体现了长久的生命力。它和高型家具的混用使人们的起居方式变化得很微妙，以至于低型家具从来就没有在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中彻底消失过。有学者以《韩熙载夜宴图》为依据论高坐起居方式成为主导的时间，而这种推断由邵晓峰著文明确提出了质疑，除了画作年代本身的诸多疑点，仅以一画而论断也确实依据不足。《宋史》的记载，说明北宋初期传统低坐的起居方式在宫廷内仍相当普遍；《太平御览》卷中关于家具的条目只有屏风、步障、承尘、囊、床、榻、胡床、几、案、箱等，并未出现桌、椅，与高坐家具有关的只有“胡床”；再对照《清明上河图》中出现最多的桌、凳，与《鲁班经匠家镜》所述的一字桌式、板凳式、杌子式的形制相当。可见广泛的垂足起居和高坐家具的普及应该在北宋末年。这样看来，高型家具的成熟乃至古典家具的出现，必定与起居生活方式的衍化密不可分。家具历史问题的研究必须清楚回答起居风俗转型问题。席坐方式、跌坐方式这两种源于礼法、宗教的起居方式，它们存在的合理性是很强的，因此要探明垂足坐的普及，还要对群体意识、建筑形制的变化做相应的研究。

三 家具制造工具、制造技术的进步与制造业的发展状态等问题

中国古代制作技术由工匠代代相传，口口相授，很少有专门的著述。作为家具制造者的手工艺工匠社会地位低下，其人生自由直到宋代才得到局部解放。因此，家具设计和制作一直未能得到系统的研究和发展。《清明上河图》中条凳和半桌协调成套，且形成较明显的侧脚形式，显示当时的高型家具与建筑的大木作技术关系很大；辽、宋、金的墓葬考古，从砖雕壁画到家具实物，都显示出高型家具制造的日益发达；而北宋留下的绘画更说明家具制造有与前代大不相同的新技术支撑。宋代究竟发生什么样的技术革新和进步？宋代家具制造者与家具发展有何关系？这些问题也都需要给出解答。

四 宋代家具形制特征与风格问题

现存北宋末年的绘画显示了和前代家具不同的造型和审美品格，南宋绘画中家具的形制多样、装饰华丽，桌案的束腰、券口牙子、腿和足雕刻的文饰大幅度增加。张十庆先生在《关于宋式弯腿带托泥供案》中提及镰仓与京都（日本中世宋风禅寺的主要基地）禅寺形态及家具形制都忠实模仿南宋江南禅寺作法，其宋式供案皆为翘头案，雕饰尤其丰富和精美，是历代供案形制中最精美的。另外，公元1180年成画的《大理国梵像卷》中所绘家具约68件，包括禅椅、几、案、榻、屏风、交椅、凳等诸多家具，也表现了与宋代家具深刻的关联。这一类说明了两宋家具形制发展和区别的的证据有不少，展现了宋代家具重大的形制转化的运动和潮流。这场运动所带来的家具形制与风格究竟如何呢？另外，还必须关注的是唐宋间建筑大木作的成熟化，《营造法式》标志着建筑的“古典”阶段，而高型家具的结构逻辑与建筑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大木作的发展对家具框架结构发展的影响应该予以足够重视。

目前对宋代家具的研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家具的形制、制造、风格、演化等问题。本书将宋代确定为中国传统家具从“古风”转型成为“古典”的关键时期，尝试深入研究的有以下几方面：

（1）根据我国木工制作的基本技术早在战国时期就大局初定^②，而汉墓画像石、中唐壁画上都出现过高足案形象，所以笔者认为高型家具的形制并非是受形式理解和制造方法的局限而进展缓慢，而是使用者需不需要、采不采纳的问题，这包括家具的使用功能、认知象征性和审美体验等方面的转化。高型家具究竟依据哪些条件才得以快速发展并成熟？本书会提出相应观点。

（2）家具是内含于建筑并共同为生活起居服务的，所以本书将家具与建筑布局、生活起居共同考量，回答宋代家具的配置如何适应起居方式，以及这种转变与建筑布局之间的逻辑关系。

（3）对宋代有代表性的家具类型的形制进行研究，并对比明式家具与宋代家具形制的异同。宋代高型家具形制有自身的特征，对明式家具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两者间的辨异将回答“古典”家具发展前、中期的风格界定问题，本书也将依据此项研究提出“宋式”家具的概念。

（4）宋朝在我国历史上独具特色，其文人组成的新型官僚集团管理体制、理学的格物致知、儒道释三教合流的艺术审美、发达的市场经济农商社会，都深刻影响了宋及以后的社会伦理和风俗文化，本书将就以上这些社会因素对高型家具的影响做剖析。

（5）对宋代家具研究而言，我国民间木工营造专著《鲁班经》，明人编撰的《三才图会》、《古今事物考》，保存于《梦溪笔谈》的宋人喻皓所著《木经》中的少量资料，宋太常博士聂崇义撰《三礼图》，金元间薛景石图文互释的《梓人遗制》以及流传至今的《燕几图》，都是弥足珍贵的。尤其《燕几图》可以说是留存至今唯一的宋代专门的家具书籍，而且相当完整，与后世明代戈汕编成的《蝶几图》颇有渊源。本书对《燕几图》做进一步研究，也以此与《蝶几图》进行比较。

（6）我国古典家具既有豪放、率真、自然的审美内蕴，也有华丽、细腻、讲究法度的审美追求，这种矛盾的共生共荣，有其存在的原因和发展的途径。胡德生先生曾提出中华艺术有一种从未消失的抽象性和写意情结的混沌之美，华美、朴素两种美学理念，始终互相借鉴又保持其独有特质，交叉又平行发展^③。本书也将对“古典”家具审美结构的形成进行一

定的研究。

以上这些问题，涉及面很广，笔者深感所学有限，因此仅将研究的重点锁定在“古风”家具向“古典”转型的时机和原因、“古典”成型的过程和特征这几方面。

注释

- ① 叶德辉,王斌辉.中国传统家具造型变化与文化分析[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69.
- ② 林寿晋.战国细木工榫接合工艺研究[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
- ③ 胡德生.明清宫廷家具二十四讲[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

目录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历史转折于唐宋	1
第一节 如何看“古典家具”	1
一 “古风”与“古典”在家具研究中的所指.....	1
二 本书研究方法.....	2
第二节 一些史学的启示	3
一 中古历史的转折点.....	3
二 其他历史学的启示.....	4
第二章 古风家具的流变	12
第一节 古风源流	12
一 回溯宋以前的家具.....	12
二 两汉到东晋的古风根基.....	14
三 “胡气”东渐与南北朝家具.....	15
四 唐代的浪漫变异.....	17
第二节 高型家具的雏形	19
第三节 坐与坐具	21
第三章 古典家具开拓期	25
第一节 《燕几图》的预示	25
一 版本与作者.....	25
二 图谱家具的形制研究.....	27
第二节 墓葬考古中的古典家具早期遗留	30
一 辽代墓葬中的高型家具.....	30
二 北宋墓葬中的高型家具.....	31
三 起居双中心的建立.....	32
四 北宋高型家具各要素的关系.....	34
第三节 《宋史》之征兆	36
第四章 古典家具的成型	41
第一节 高型家具的成熟	41
一 两宋风俗生活中的高型家具.....	41
二 家具典制的形成.....	49

第二节	两宋家具特征与差异	57
一	北宋家具特征	57
二	南宋家具特征	62
第三节	古典家具的秩序图式	67
一	建筑之“整体模式”	67
二	建立古典家具的秩序图式	69
三	古典家具的结构渊源与形制转化	71
第五章	宋代家具与明式家具辨异	78
第一节	成因与形成背景之辨	78
一	“明式”的必然性	78
二	《蝶几谱》与《燕几图》的比较	82
第二节	家具形制的七种对比	84
一	尺度与功能	84
二	材质之美	86
三	榫卯与受力	87
四	关键的线脚	89
五	细部决定气质	89
六	组合构件的搭配	91
七	样式	92
第六章	结论：可以称“宋式”	96
一	古典家具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96
二	“宋式”的界定	97
附录		99
附录一	唐、五代画作及壁画、出土所载家具列表	99
附录二	宋代等壁画明器及墓葬家具实物列表	111
附录三	北宋画作中的家具列表	131
附录四	南宋（金）画作所载家具列表	140
附录五	元代画作和元代墓室壁画、明器、什物等家具列表	165
附录六	明式家具榫卯结构与连接方式列表	174
附录七	南宋大理国张胜温画梵像中的家具列表	193
图表来源		204
后记		208

第一章 历史转折于唐宋

第一节 如何看“古典家具”

一 “古风”与“古典”在家具研究中的所指

《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中没有古风家具、古典家具的词条，这是因为这两个名词是对一段时间内家具共性的描述，而非指称某一种特定风格的家具，所以难以界定。该辞典家具卷第四条是“古典园林家具”，解释为“明清时期，产生于苏州古典园林发展中形成起来的一种家具类型。”进一步的解释为“反映封建文人和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观念与艺术情趣……集中地体现了‘明式家具’的优秀水平。”^[1]这段解释说明三点：一是“古典”二字关注的不仅是时间范畴，还有思想观念和艺术情趣；二是此类家具常常依托古典园林环境；三是“明式”家具为古典的代表。由此引发的问题是，狭义的古典家具究竟有什么核心特征？“明式”之前“古典”家具是什么状态？为何这类家具常常依托园林表现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情趣？

根据我国中古时期的历史发展特征，笔者将传统家具的主要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古风”、“古典”以及两者之间的“过渡”时期，依据的是家具的使用方式、功能、形制、审美内涵等因素的同一性。我国中古时期在外来文化深刻影响前形成的建筑、室内及家具，具有统一的文化内涵，是本土原生文化的产物。这一时期，家具系统受礼制约束为主，发展不完整，以“古风”称之。外来文化在六朝时期及以后形成巨大影响，社会人文与思想都发生转变，由此生活起居和家具都进入了一个长期的“过渡”阶段。此阶段表现出混杂融合的创新，不过“古风”在民间依然是主流方式。到“唐宋变革”时期，社会发生巨变，进而宋代造物领域快速发展的结果是高型家具由普及到成熟，“古风”被剥离出历史，最终“古典”家具诞生。

以三个阶段家具的使用方式来看，前面两个阶段在起居单中心、等级象征和审美判断上具有密切的联系，与第三阶段有明显的差别。

首先，起居单中心的概念是与高型家具普及过程中建立的起居双中心对比而产生的。在“古风”到“过渡”阶段，生活起居围绕席或床榻完成，餐饮、议事、会客、睡觉可以都在一处，使用同类家具完成各种不同行为和空间功能。而高型家具的普及产生了明显的内外之别，内室以床榻、盆架等组合，承担休憩、睡眠等功能，而外室以一桌二椅的标准配置为代表，服务于会客、餐饮等家庭成员的共同活动。

其次，前面两个阶段家具以类型来表达阶层象征性，“古风”阶段尤为严谨。家具的类型少，除了席子是必须有的家具外，几、案、俎、扆、箱等都根据等级的要求配置，比如屏风、几案的使用有明确的地位象征性。“过渡”阶段家具类型在上层内部虽然有所放开，但在民间依然有很大的限制。而“古典”时期家具虽然也具有阶层象征功能，但主要不以类型而是以形制来表现，比如靠背椅、屏风、几案的运用都很广泛，只是形制有繁简规格之别，以显示阶层的差异。

最后，“古典”家具的审美判断包含了世俗化的内容，表现出务实理性、追求文人情趣的特点，这与前两个阶段以贵族审美为核心的特点明显不同。唐宋变革以后，社会结构调整，

文人地位上升,社会中层成长,成为社会文化的主要引导阶层。另外,平民对家具需求的不断增长,也影响了家具审美内涵的变化。

所以,可以将家具历史的前面两个阶段视为广义的“古风”,其中第一阶段是严格意义上的“古风”,而第三阶段的家具就归为“古典”。本书研究将广义的“古风”作为“古典”的基础,尤其是“过渡”时期的家具演化对“古典”有深刻的影响。过渡期也可以称为床榻坐时代,跌坐方式渐渐成为主流,家具类型也有所增加,床榻代替席成为起居中心,家具加工能力有比较明显的提高,以大型的壶门家具为代表,各种家具装饰也得到相应的发展。这为高型家具和垂足坐起居的普及建立了良好的物质和心理基础。

毋庸置疑,“明式”是中国古典家具最具代表性的风格,但同时“明式”并非“古典”家具的全部。笔者依据“古典”家具与广义“古风”家具的重要区别,设定“古典”家具除形制特征以外的几项核心特征,作为本书对“古典”家具研究的基石:

(1) “古典”家具类型完整丰富,服务于起居双中心和垂足坐。

(2) “古典”家具等级象征依赖形制而非类型。

(3) “古典”家具的功能、技术、美学各要素协调统一,关注生活效能的提高,带有社会世俗化、商业化的倾向。

(4) “古典”家具的审美内涵以封建文人和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观念与艺术情趣为主导。

我国的造物智慧来源于根深蒂固的有机自然主义思想和对人性平衡的追求,古典家具形制虽然与“古风”时期区别很大,但在思想传承和造物逻辑上有密切的联系,都能体现这一智慧。

二 本书研究方法

研究家具需要在整理社会发展背景的基础上,深入解析家具在生活风俗、制造行业、商业市场等方面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对同时代的不同地区家具形制进行对比研究,才能理清家具演化的内因、外因以及发展途径。所以本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对比研究方法,对比的对象有纵向和横向两种,都包含对家具形制的差异和联系的研究。

西方史学界一直对中国的历史研究提出质疑,凡是没有考古证据的历史就很难被接受^[2]。但是考古的证据,无法排除其历史的偶然性。因此,发现的文物只能代表物质文化的极小一部分,而极小一部分中的大部分还是古代上层生活的物品。中国对古代文献的质疑在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文献怀疑论推动下于20世纪后期达到高潮。疑古精神虽然可以提高历史研究的严谨度,但是全盘的怀疑论也具有极端和缺乏理性分析的性质。

因此,本书还借鉴年鉴学派的历史研究方法,关注的领域包含纵向的(思想观念、演化时态)和横向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制度、对外交流等)两方面。法国年鉴学派所运用的历史研究方法,借助历史人类学关注观念、心态、欲望、习俗、风气、行为的视角来建构历史的真实。作为世界史学界影响巨大的学派,它的基本原则是“总体史观”,强调广泛研究而不是受限于历史文献资料的信息,是结合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展开的综合研究的方法^[3]。中国考古学之父、人类学家李济先生也鼓励现代考古学的方法,认为应该将文献史料、实物史料与假说结合,才能做到尊重历史逻辑、摒弃主观臆断的整体史观。西方学者在对西方家具史研究中关注的问题远远超出家具设计及风格的范畴,史学家非常重视的方面有:家具生产的经济背景,家具的使用情况,家具工场的组织系统,家具制作的劳动分工,设计、工艺流程与使用功能之间的联系,国际交流的因素,社会变革的影响,家具

市场的运作系统，家具生产条件的进化情况，家具行业的师徒传承系统等^[4]。宋代考古证据比较丰富，但同样存在举证有限的问题。所以本书也将在总体史观的引领下，遵循文献史料、实物史料与假说结合的方法，以求尽可能防止主观臆断，而建构家具演化历史的系统和过程。

第二节 一些史学的启示

中国建筑史研究发展 80 余年来，研究的课题已经从基本的“是什么”、“什么样”、“如何断代”等深入到现今对“渊源”、“规律”的追寻。这种由表面现象向内在动因的研究轨迹，是造物史学发展的必然。相应地，我国传统家具自艾克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系统研究至今，虽研究成果和研究者都不如建筑的量大面广，但也同样从对现象静态的分析转变为对动态内因和规律的探索。家具承载着人、建筑和家具本身大量的文化信息，如果家具史是模糊的，则很难说建筑史是完整的。

对中国古代家具的历史分期和风格，有学者提出“曾明显形成四种最重要的设计风格，即楚式家具（周代至南北朝）、宋式家具（隋唐至元代及明代早期）、明式家具（明中期至清早期）、清式家具（清中期以后）。”^[5]其中，对楚式家具、宋式家具的分法太过模糊。且不说周代到南北朝超过一千六百年的历史跨度中，家具在风格和区域变迁上都有很多变化，就隋唐至明代早期间，隋唐家具形制与两宋到明的家具形制差异就十分巨大。在几个概念中，除了明式家具是被杨耀、王世襄等几位前辈论证过之外，其他几个的定义都遭到质疑。家具风格的界定，根据现有“明式”的界定方式，笔者认为应该包括时间界定、特征界定、价值及影响界定这几项才能基本达成。这些内涵需要其他历史研究的触动和启发。

一 中古历史的转折点

我国传统家具的历史分期，与我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有密切关系。根据目前国史学权威《中国通史》的描述，我国上古和中古史的划分是以秦朝为界的，中古是指自秦朝始到清朝晚期。依据国家统一集权性质和农业立国的相似性而界定的“中古”，避开了因我国历史的特殊性而产生的社会性质定名的问题。漫长的“中古”跨度非常大，这超越 2000 年的历史虽有其同一性，但内部也存在阶段性的巨大区别。“古风”与“古典”家具就是因中古历史发展中巨大的转折，前后形成的两种不同的体系，服务于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要求。

我国历史的宏观特征表现出两个基本特点：第一，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总结历史发展的“希腊模式”后，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在国家统一性方面卓越的能力^[6]。杨师群先生的《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一书也提出了中国古史走的是自己独特的历史道路。第二，中国历史与其他人类历史一样，有从低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向高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变革的客观趋势。台湾学者葛金芳就提出“地无分中西，人无分南北，……都要走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诉求”^[7]¹⁴¹。这两个特点共同发生的作用，就是“中古”广受关注的转折点——“唐宋变革”。

日本京都学派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在 20 世纪前 30 年提出“唐宋变革期”的研究观点，曾引发我国国史研究的激烈讨论。钱穆、漆侠等对“变革”多加认可，其他更多学者则是将其柔化为“转型期”。无论怎样都是承认“中古”存在前后显著区别并深刻影响后世的过渡时期。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如果承认“变革”，那就一定要有社会性质整体的变迁，这正是京都学派“中国历史从中古转变为近世是发生在唐宋之交”观点的立论基础^[7]¹²⁸。这种判断

无疑受了西方史学理论的深刻影响，即革命性的转变通常要打破一种稳定、建立新的稳定和新的社会性质。但由于我国历史的特殊性，即历史发育的早熟，使国家性质和思想体系异常稳定。这一判断不能简单运用在中国历史上由此美国学者赫若贝（Robert Hartwell）、包弼德（Peter Bol）等就从人口、地区、精英之间的关系模型来研究，认为唐宋之变，不具备社会性质改变的特征。

我国造物领域也具有一样的稳定性质，“古风”家具表现出特别持久的性格，直到“唐宋变革”取得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变的巨大积累后，才顺应社会发展和生活方式要求彻底放弃了“古风”。这是因为中国先秦时期建立的思想体系具有“整体模式”的特征（此观点见笔者的论文《探究中国古建筑整体模式问题》^[8]，本书第四章也会分析），其最显著的能力为自我调节、内部转换和相对稳定。

“唐宋变革”给本土原生文化带来了一次复兴的机会，这与欧洲“文艺复兴”具有历史的相似性，在内涵上都带有很强的创新内涵。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现象占主导地位，“其一是统一王朝和异族的交接，另一个是宗族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冲突。”^[9]前者促使本土文化发现自身思想信仰的优势和独特性，后者事关国家成长中生存结构的合理性，两者的互动最终产生了从国家管理架构到生活风俗各级的重构。宋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必然下呈现出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思想体系的快速发展。相应地，“古风”家具因无法满足新的社会特点而彻底蜕变。

所以说，在中古历史的转折点，即唐宋间，传统家具的最大转型也随之发生。这一次转型是将中国人思想和造物的智慧做了一次集中的释放。汉宝德先生曾归纳我国造物逻辑为人肢体的延伸，能够以简单的棒状构件，通过一定的逻辑量化成复杂的整体。这种使我国建筑具有强烈的自然有机属性的方式，在家具低矮、使用受限的“古风”时代很难发挥，而宋代高型家具因突破了这些限制而迅速发展。

二 其他历史学的启示

中国家具的发展始终内涵了本土特殊的自然观念、等级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和审美观念。唐开军的研究认为“家具风格的形成主要受到政教思想、建筑形制、社会现状三大因素的影响。”^[10]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中国特定的地理气候所濡养成的区域文化特性及其变迁，也应该纳入家具风格变迁的轨道。笔者的研究也受到前辈学者在我国气候、地理、社会政治文化等历史研究的启发，其中与“古风”到“古典”转型有密切关系的内容陈述如下：

1 气候学、地理学的启示

竺可桢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对中国古代气候变化分阶段的重要观点^[11]。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在气候上整体呈现温暖期越来越短而寒冷期越来越长的特点。

文明史早期气候温和，竹类的分布沿黄河流域延展到东部沿海，使竹材质的利用在包括中原地区的比较广泛的范围里成熟了^[12]。与此形成重要关联的是席坐方式以及相关家具的形制特征，这使得竹造物文化不仅成为“古风”家具的重要组成，也影响了后世高型家具的形制和构件。

先秦时期楚文化造物优势突出，又在汉朝得到发挥和提高，形成“古风”家具造物的主流特点，也成为后世家具发展最重要的内在力量。其最吸引人的特征是将功用、耐腐朽、美观结合一体，具有善于变通、善于搭配的设计思维，这在楚墓出土的家具上有所体现，如漆木床上配用的竹屨、竹栏杆^[13]，原因绝不仅仅是“楚地气候炎热，竹器比较清凉和透气”^[13]，而是其在用材能力、构造能力、功能与风格的结合上确实具有超过其他地区的优势。

汉朝开始的降温过程在 4 世纪中达到顶点，持续了 5 个世纪以上。这不仅使竹类分布退到了长江流域，也使外族侵入迫使中原汉文化向南迁移，“古风”家具从存在条件到形制上都受到巨大冲击，表现出至少以下几点：①席坐传统逐渐由床榻坐代替。②竹、木兼有的“古风”家具经验在中原地区由以木制为主流的家具体系吸收并发展。③中原地区的原生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家具形制相互影响而产生新的可能；原中原地区的造物特征向南侵染，与长江流域及以南文化汇集并发展。

气候变迁使席坐传统逐渐失去了物质支持，席坐起居的舒适度降低，同时外来文化介入，使得“古风”动摇。我国家具史从此告别了严格意义上的“古风”，不过“古风”家具的影响长期存在，在南方，席坐的遗传逐渐演化成木制家具的软屈坐面。

气候变迁以历史积淀的不同方式促进了我国南、北方文化差异的加大和固定，也必然影响风俗及造物。本土核心文化南迁使南方文化快速增长，《南史》、《景定建康志》、《梁书》等文献印证了南朝的繁荣，其中非常重要的现象是商业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的经济模式。建康城“城中有四个市。秦淮河北岸有大市，还有小市十余所。出现了专业市场，如谷市、牛马市、纱市、盐市、花市等。”^①齐朝皇帝还曾经“又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杂所货物，与宫人阍竖共为裨贩。”^②商业发达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与南方享乐主义的文化特点共同作用，带来各种形制突破与僭越的现象，也促进了家具领域的文化混合。

南北差异在隋唐时期相对缓和，气候回暖的唐代渐渐向多元经济发展，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和生活风俗中更舒适、更高效的取向使得“席坐”这种压抑、低效率的起居方式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因此，“席坐”的渐弱到消亡随着高坐起居的发展普及而成为必然。北宋中期开始的降温在物质条件上加快推进了高型家具的使用，这次降温在 12 世纪达到顶峰^[11]，所以高型家具发展不因气候而发生却因气候的影响而日益稳固（图 1-1）。

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提出中国五千年间经历了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11]。这些时期不仅显著影响着历史朝代变迁，也使我国文化性质逐渐改变，主要是促使了本土思想体系的早熟、转化、复兴的过程。特别是第二寒冷期使北方匈奴、鲜卑、拓跋、氐、羌、羯等民族发起对中原的资源争夺，连带外来宗教与文化和本土文化不断碰撞，致使传统文化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总体来讲，由于温暖期越来越短，我国历史宏观上具有本土文化重心逐步南移、商业经济力量渐渐上升、文化性质多元化等趋势。

在气候变迁致使南、北方文化差异扩大的基础上，区域地理特征对我国家具造物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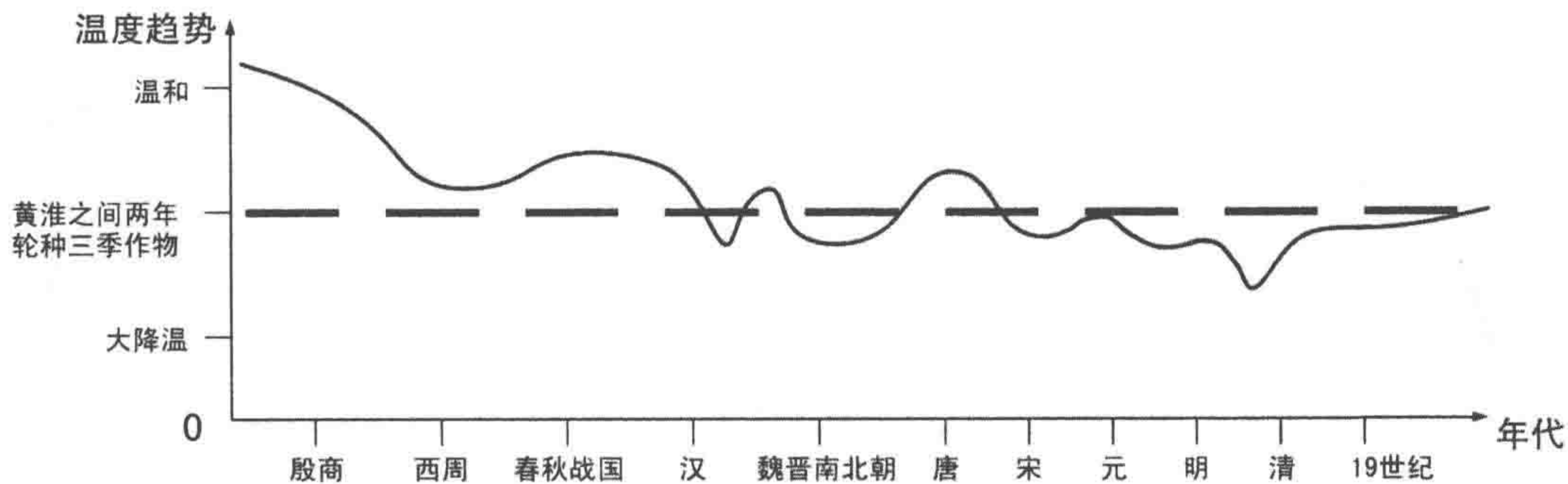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历史气候变化趋势图

也有显著的影响。李约瑟博士描述中国地理为：“有一种复杂的群山山脉网把许多比较平坦的地区分开”^[14]，也就是虽有两大河流体系沟通东西，但是却经由山脉的阻碍形成相异的文化区域。

北宋东京汴梁(今开封市)平原沃野、四通八达,拥有历唐、五代形成的优势,开封有汴、黄、惠民、广济四河以通漕运,汴连通黄淮,尤其是东京的命脉。北宋西界为河陇、秦岭、巴蜀,山高势险,划分了东、南侧肥沃的汉中、成都平原和西、北侧贫瘠之地。而西南滇黔高原地远难治,宋以大渡河为界弃滇为一方大理国。所以说北宋基本上已将最具发展优势的土地都控制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宋室南迁后是以淮河秦岭为界与金南北分据。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到了临安,依赖两浙的物产和秦岭淮河的障碍得以偏安一方。杭州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钱塘江下游、京杭大运河的南端,长江流域土地开发和港岸优势自然成为南宋文化发展的基础。这里五代时期在吴越国君钱缪(852—932)的治理下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吴越文化,中原文化和外来佛教文化都得到礼遇、产生融合,这对南宋的经济发展和造物创新有良好的影响。

许多地理学家如侯仁之、谭其骧先生等,都非常重视区域差异和区域人文的整体结构。具有一致性的区域不仅是空间结构上的,更是资源环境结构和文化结构上的^[15]。

我国北方自古以来利于发展农业。“黄土的保墒能力使得人们能在雨水很少的条件下获得丰收。”^[14]传统小农经济上千年的发展,形成北方自足、保守、忠诚、稳重的文化特征。犍陀罗式的佛教文化在公元初到二世纪沿着丝绸之路来到我国,与西北异域民族势力南侵的历史形成呼应,造成中原文化南迁。但古风家具的动摇未能快速地产生新型的起居和家具体系,其主要原因正是北方中原地域本土核心文化深厚的根基作用。这些特点发展到北宋表现得更加务实,虽然上层家具依然追求华美复杂的形制,但整体来说,高型家具具有追求实用、节俭、理性的趋向。随着北宋社会生活向舒适高效的方向发展,高型家具的普及在中原地区成为必然。北宋民间家具虽然形制较为粗朴简放,但搭配关系严谨有度,带有重礼内敛的内在性格。

南方造物对汉代造物文化的保存更好,相较于北方明显趋于细腻、灵巧、温婉。北宋期间南北交流顺畅,到北宋晚期中原地区的上层家具已经出现了纤美、华丽的制作。宋室南迁后,以江南为代表的南方文化再次得到与中原文化充分融合、发展自身优势的机会。首先是对细节的追求,这满足并提升了生活享受和家具价值感;其次是制造业的优势得到完全的显现;再有就是融合了北方的务实和南方的灵巧,使造物的内涵得到提高。

我国土地开发的过程从黄河流域的解池、伊洛到关中平原,再扩展到中州大平原以至北方各区域,然后是吴越震泽和南宋才成熟的湖广盆地,这个漫长过程与我国本土核心文化的逐渐南移形成关联,又与日益发达的水路商贸互相促进。这使得高型家具在宋代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平台,类型逐渐多样、形制不断丰富,由南北差异发展到融会贯通。

2 宋代新政治、新文化的启示

宋代大力发展了平民出身的文人官僚体系,对皇帝集权形成最强有力的支持和同盟,完成了“唐宋变革”政治上的任务,促进了社会进步。新政治体现在重视以国家管理强国而非以武力强国,但文强武弱、强干弱枝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7]129}。阿诺德·汤因比所著《历史研究》阐述了大国为维护中央集权而承受的巨大的边戎压力,这也是宋代颇具活力的新政治下“三冗”难题的根源^{[7]129}。为此,宋代大力促进社会农商并重的发展,借重于新兴的

平民文人官僚集团（后文简称“新兴官僚集团”）。这个新兴官僚集团主体来自平民，关注社会民生，以创造和维护文化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具有显著的优点。

（1）务实进取

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明确提出了15英寸等雨线与中国历史的密切关系，《亚洲史》作者罗兹·墨菲对亚洲季风的关注也出于相同视角，因为15英寸等雨线正好就是亚洲季风的自然边界，其东南、西北两侧，正是历史上内外势力互斥的地区。北宋时采取比这条中原安全的敏感线更向南设定边界的办法，可以说迫于无奈，不过确实获得了在自然条件下最有利于生存的土地板块。李约瑟就认为宋代为国家安定统一的局面，采取了“聪明而简洁的战略”^[14]（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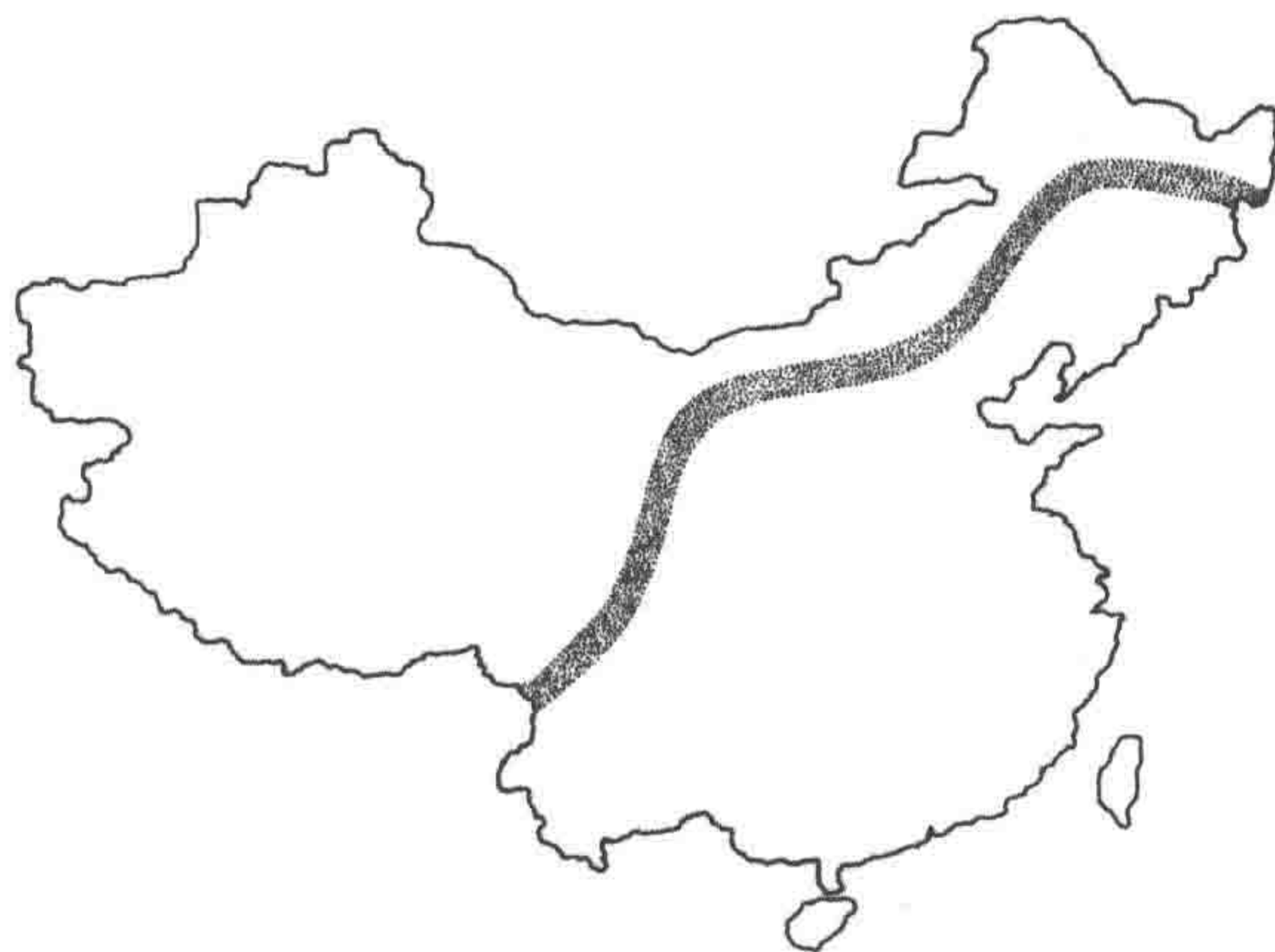


图1-2 15英寸等雨线示意图

宋朝上层主动形成了相当完善的经筵制度^[16]。在增强国家集权与官僚管理、提高统治者的素质和正确决策方面，表现出务实积极的态度。在此基础上，新兴官僚集团以农业、工商业并重的经济发展方式增长国家税收，积极解决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各项问题。北宋中叶“租佃制生产关系完全契约化，是这一时期重大变革的一个方面。”^[17]这使土地的利用率、生产者的能动性都大大提高。此外，地方官员引进推广高效农作物、重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教育、注重水利设施的维护和兴建，蒙文通先生考证宋代农田产量比唐代多4/3倍。农业的结构性调整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化，工商业成长为国家两大支柱之一。新政策还使禁榷制度所具有的明显弊端得到降低，工商业者拥有相对较大的自主权，市场自主运行成分也逐步增加。

（2）关心社会民生与文化创新

宋代的繁荣“面临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城市勃兴……中国内地与国际贸易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18]大量历史记载展现了“新兴官僚集团”在寻求国力增长和文化发展上付出的巨大努力。王安石变法之前有“庆历新政”，之后有“孝宗之治”，都是以政治变革带动社会经济、阶层结构、文化与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发展的例子。《梦粱录》有道：“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然虽差役，如官司和雇支給钱米，反胜于民间雇倩工钱，而工役之辈，则欢乐而往也。”^[19]表明宋代官府在“差雇”上尊重并引导市场的合理化。内藤湖南的弟子宫崎市定认为，宋代斐然的成就是来自“复古运动和对原点真理的追溯”^{[7]136}，这一文化创新的特征，不仅是“唐宋变革”孕育的本土原生文化复兴的努力，也是因新政治所具有的超越传统、服务现实的特点。

因此，宋代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包括厢坊制的城市肌理，专门的城市户口出现；中小经济型城市以草市、镇市为基础沿水路发展扩张；海外商贸成就的国际型经济城市。北宋城市很快突破了在唐末已经开始松动的“坊市”制，而且“市”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构建出商业繁荣的新城市形态。“坊廓户”于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在洛阳出现，并根据各户财产状况分十个等级^[20]，充分说明城市非农户口（工商业者为主）的规模。宋代沿水